



## “爭鳴”“齊放”，以理服人

“爭鳴”，顧名思義，即眾人發表自己見解之意。你“放”你的意見，我“放”我的意見，意見不同，則需要“爭鳴”一番，在爭論中辨明是非，在爭論中求得真理。

這本已為眾所周知，原無須多言了。然而，目前却有一種論調：認為只能“放”，不能“爭鳴”；“爭”就是“打擊報復”，就是“收”。當然，有這樣看法的人，很多是出於誤解，但是也有人另有用意。這個用意說穿了那就是：只准我鳴我放，不准你鳴你放，只准我批評人，不准人反批評我，否則就是“打擊報復”，就是“攔路虎”。

當然，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見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所以共產黨人必須放手鼓勵批評；凡是從加強社會主義事業，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加強黨與人民團結的目的出發的批評，無論怎樣尖銳，都應該熱烈的歡迎，都應該象“禹聞喜言下拜，子路聞過則喜”。對待這樣的批評的任何阻礙壓制、打擊報復行為都是錯誤的，是黨所永不寬容和堅決反對的。

然而，黨並不反對正確的批評；並不主張只准這部分人鳴放，不准另部分人鳴放，並不認為“爭”就是打擊報復，就是“收”。相反地，象某些會上所發生的只准自己鳴，不准別人講話，只許自己“放”，不准別人答辯，倒是阻礙鳴放的行為。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少數人專橫，多數人“收”而不“放”。

人人有爭“鳴”的權利，反對阻礙別人鳴放！實行“爭鳴”“齊放”，反對專橫作風！只有這樣，才能明辨是非，才能認清真理；只有這樣，才能“放”得深入，“放”得徹底。此外還有一種論調認為，既允許大鳴大

放，即便是潑口罵人、信口開河亦無不可。於是象“混蛋”、“卑鄙無恥”以及“慢板”式的“王婆罵街”（群眾對大字報“慢板”的諷刺批評），象“禍國殃民”、“滅絕人性”、“反革命分子”……一棍子打死人的帽子都出現了。

當然，我們不是一概反對戴帽子，恰如其分的帽子還是應該給戴上。但是我們更主張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談具體事情，不分析問題，而誹謗謾罵，亂扣帽子，這不是“爭鳴”，而是無理取鬧。

署名為鐵59.2班12同學的大字報寫道：“我們堅決反對謾罵和攻擊，例如：「慢板」作者的言論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又如什麼「禍國殃民」、「滅絕人性」……又是什麼態度？我們應該以「治病救人」的態度協助黨整風，掌握「團結、批評、團結」及和風細雨的方針，揭露事實，以理服人。”署名為機械系一羣助教的大字報中也提出應該“大力展開自由爭辯，不要謾罵和亂扣帽子”。顯然，這些意見是百般正確的，是符合整風精神的。那些借整風之機，洩個人之怨，蓄意污蔑中傷、挖苦謾罵，進行人身攻擊，這些態度都是錯誤的。

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採取講道理的態度，分析的態度，平等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開展“爭鳴”。是真理，採取上述態度，則更能夠為群眾所接受；不是真理，不論他採取什麼態度，一定會為群眾所揭穿。

近一月來，我院師生員工，為了幫助黨進行整風，已經“鳴、放”了不少意見。所有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還應該繼續大鳴大放，堅決地向“三害”進行鬥爭；同時要大胆地展開“爭鳴”，在“爭鳴”中深入地“放”，在“爭鳴”中辨明是非。這樣，整風運動才能健康地向前發展。

人認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是教條主義，因此病根還是主觀主義。）

**(三) 要不要肅反？要不要發動群眾起來肅反？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關於對肅反的估價問題有如下三種見解：**

(1) 肅反運動的路線是錯誤的（有兩種說法：（甲）肅反運動本身就是路線的錯誤；（乙）肅反不應搞群眾運動。）肅反運動破壞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制；我國的肅反運動和斯大林犯了同樣的錯誤——肅反擴大化。因而肅反運動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

(2) 肅反運動的路線是正確的，方法是錯誤的。由於肅反運動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採用了對敵鬥爭的方式，所以肅反運動的偏差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

(3) 肅反運動的路線是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甲）有些地方採取粗暴的方式批判思想；（乙）對檢舉材料未作深入的調查和分析研究；因而也發生了局部的偏差。然而通過肅反運動，確實查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人民也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覺悟，所以還應該說成績是基本的，偏差是局部的。

**(四) 幹部班要不要取消？**（有人認為辦幹部班是一種浪費，有人認為培養老干部這是黨的宗派主義的表現。）**幹部班不應設在鋼鐵學院？**（有人認為幹部班不應設在高等學校；有人主張，幹部班應設在幹部學校里補習中學課程，學大學課時再來高等學校。）

**(五) 關於人事制度方面有下列幾個問題：**

(1) 選拔幹部和留蘇學生應不應該重視政治條件？

(2) 系的職能是什麼？教研組的職能是什麼？（有人認為系主要負責教學行政和科學研究的組織工作，教研組應是學術單位。）

(3) 系主任、教研組主任、系秘書的職責是什麼？

(4) 檔案應不應該設置？檔案應不應該公開？（有人主張不設置檔案，檔案就是“黑名單”；有人認為既是我的檔案，我就應該知道

它的內容，“自己應該了解自己”。）

**(六) 其他問題：**

(1) 胡風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人認為胡風只是思想反動，“胡風上萬言書、是為了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並不能認為是反革命分子。）

(2) 馬列主義課程要不要學習？（有人認為信仰不信仰馬列主義是個人的自由，為什麼要規定學習馬列主義呢？）

(3) 我國的選舉制度是否民主？（有人認為提候選人選舉就是不民主；還有人認為群眾不能直接選舉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就是不民主。）

(4) 我國新聞自由否？（有人認為我國報紙不能“來稿必登”，私人不能辦報，所以說新聞不自由。）

(5) 黨中央和毛主席有沒有個人崇拜？（有人說毛主席雖不象斯大林，但是下面許多人不動腦筋，過於依賴毛主席，所以說也是有人崇拜的。）

上述問題歡迎讀者來稿，發表自己的見解，進行討論。

## 設備科小組6月7日召開“鳴放”座談會

會上對工資制度和肅反問題提出意見

6月7日下午總務處設備科小組繼續召開“鳴放”座談會，大家熱烈的討論了工資制度和肅反問題，並提出了很多意見和建議。

### 一、工資方面

1. 應將這次評定工資不合理的從速予以調整，該提的提，該降的降。對以往評定工資的方式不夠民主應該提出批評，過去領導上對群眾不夠十分信任，對群眾覺悟程度估計過低，建議今後再評定工資時，應採取放手發動群眾的民主評定方式。

2. 幾年來工資制度始終沒有一套完整和正規的制度。各地區、各行業、各工種、等都各有不同，重工業和輕工業不同，部隊和機關不同，這樣對幹部調配使用方面都帶來很多困難。如部隊轉業同志一般工資比較高，同在工作崗位轉業的就高於其他同志，這樣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建議國務院對工資制度作出完整統一的規定，必要時可以採取津貼形式，區別地區、行業、和工種，這樣在工作調動後，不合理的現象就不會發生。

3. 工資級別規定太死，科長工資一定要高於科員，科員工資達到最高標準99元後，即不能再提高，要想再高就得升到高一級，——升為科長，否則即不能再增加工資了，這樣就不能很好發揮工作積極性。建議科長、處長、等職務不列入工資級別之內，而具體擔負這些工作的同志，給予適當的職務津貼，如某甲同志由科員提升科長了，就除拿他原來應得工薪外，再給予科長職務津貼；又如某丁同志工作能力很強，但領導能力弱，這樣即不一定要提升為科長，而其工資級別可以高於科長；再就是建議對工友工資標準應再考慮，因為目前工友最高工資37.50元，是不夠維持三、五口之家的，應該從按勞取酬和保證生活兩方面考慮。否則雖然有福利金作為職工困難補助，也很難保證維持生活，並且更不能很好發揮工友同志進取心和工作積極性。

### 二、肅反方面

大家認為鋼院以往對肅反工作犯了嚴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被鬥的四百多人之中結果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反革命呢？我們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絕不能把它當做敵我矛盾一樣來處理。我們看到劉景芳教授的發言，知道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因為過去學術爭論（即百家爭鳴）的空氣太不夠，一提出不同的意見，就認為是思想有問題，甚至當反革命來鬥，這種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不知扼殺了多少同志的積極性，給黨的事業帶來多大危害！建議對肅反工作徹底檢查，對一切錯鬥了的同志，使他們能心平氣和的參加建設，也只有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的證明黨的英明、偉大和大公無私，黨委負責同志！希望你們能儘快的處理這些意見。

## 大家來“爭鳴”

院刊編輯室

在“放”的過程中，大家除對黨委領導的“三害”提出了許多中肯而有益的批評外，並又提出了一些“爭鳴”的問題。現在院刊編輯室向大家介紹幾個“爭鳴”中的問題和有些同志的見解，供大家參考；希望讀者們大胆“爭鳴”，熱烈討論。

**(一) 在學校中是要加強黨的領導？還是要削弱黨的領導？究竟如何治校？關於如何治校問題有如下幾種見解：**

(1) 要求把學校交給內行人（教授、講師、助教而不問是黨員或非黨員）來辦。反對黨委治校。即反對黨委在學校包辦一切，統治一切。反對學校中黨政合一。要求以校務委員會治校。教授、講師、助教、職工、學生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以院長為當然主席，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院長須在學術界有相當地位。共產黨在學校內設立黨支部，領導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輔助各種工作的實施和完成。

(2) 黨的領導是要的，反對要求黨委撤出學校。但黨委主要工作是處理黨內事務，應成立院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決策機關。院務委員會的建立，有人主張普選，有人主張民選。

(3) 不贊成“教授治校”，主張實行“黨委制”；要求加強黨的領導。但黨委應改進領導方法，發揚民主，充分發揮教師（尤其是教授）的作用。具體辦法是擴大院務會議，邀請教師代表參加；院務會議應切實地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也有人建議設立教師代表會議或教職工代表大會，听取群眾意見，討論學校的重大工作。

**(二) 在鋼鐵學院，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黨群關係的癥結在那里？怎樣改善黨群關係？**（有人認為我院的官僚主義最嚴重，所以說鋼院的主要矛盾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有人認為我院的宗派主義最嚴重，所以說鋼院的主要矛盾是黨群之間的矛盾；有



# 如何治理学校？

编者按：如何治理学校，这是我院全体师生员工极关心的问题。很多同志，在座谈会、鸣放会及大字报和院刊上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看法不一，所以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展开深入的专题讨论。

## 我不赞成教授治校

### 更不同意校委会治校

探礦系教授 華鳳詠

(1) 教授是科学工作者，他研究学术多年，有教学經驗，应当使用他的精力，專心于教学及科学研究，如果耗費他的很多時間及精力，办理行政，这是国家很大的損失。但是他能够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表他的經驗及深刻的見解，以供採納及参考，这是最适当的办法。

(2) 校务委員無人能够約束他們，無人監管他們，一朝權在手，就要暢所欲言，很容易产生誤差。不象党委制，共产党內有組織有紀律，要管教的，他們不敢肆意而为，否則要受处分的。我这番話不是随便說的，由于有以下的事实：52年校系調整以前，我在天津大学，当时是校务委员会治校，校主席及校务委員全是教授及民主党派教授(民盟)。

校主席控制不了校务委員，結果搞的很乱。校务委員对女秘書有非礼行为鬧出事情，校务委員因私事开除建筑工程师；校务委員的兒子兒媳在校外工作，有房租津貼，而任教授宿舍上等的房子，教授反住次等的房子，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太不成話，我实在看不过去，所以在全校教職員工大会上，我不顧利害，历举事实，質問校主席，当时我每說一句話，群众鼓掌之声，响彻云霄，經久不息，足証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愤不平，为日已久，此情此景，天津大学的同事同学，当能記憶的。

武汉大学解放后，亦是校委治校，党派了徐懋庸作秘書，徐到是掌握一切，然而黨員很少，徐为少数人包围，眼界不广，等于放在木筒內，結果搞的不好，这都是校委会治校的结果。

(3) 我們要民主，但不能只凭理論的民主，要从事实出发，我們目的是办好学校，我認为校委治校責任散漫，不如党委治校責任严格。我們相信共产党，我們愿意共产党領導，我們国家才有希望。共产党要采取各种方式吸取群众意見。我們有我們的閱历，有我們的見解。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到我們的責任。我是人民血汗培养起来的，我要养好我的精神，專力于我的本业，搞好教学，鑽研学术，才对得起人民。我是不会作文章的人，我說的是我衷心的話，愚者局于所見，不敢武断，对与不对，盼望大家原諒，大家研究。

## 關於民主治校

馬如璋

### 1. 誰是內行

自从討論民主治校以来，“把学校交給內行的人”便成为大家喜道乐聞的話。可是什么样的人才算內行，並沒有充份的討論。据我个人听到的意見約有以下两种：1. 懂得业务就是內行。2. 懂得馬列主义的在办教育方面也就是內行。

有第一种見解的人，認为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因之教师是生产工人，所以教授講師助教是內行人。

有第二种見解的人以为：我們现在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以办教育首先要有足够的政治覺悟，懂得社会主义教育原則。特别是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因之懂得馬列主义，就可以办好高等教育。

这两种說法我認为都有他正确的一面，但都帶有片面性，只懂得业务而无視或輕視社会主义工业建設的客观需要，当然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会有問題的。有的人說我是教研組主任，只要基本附合国家需要，怎么样培养我有权力决定，“基本上附合国家需要”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可是只由个人判断是不是有时候会与实际有距离？与更懂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和其他同行的人多商量一下是不是更好一点。学

技术科学的人对自己知道的部份是很自信的，可是尊重別人所知道的並且多与別人商量，得出的結果常是更接近真理的。

有第二种見解的人，認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掌握了原則，不需要懂得“繁瑣的”业务，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远距离操縱的遙遙領導。这里所說的业务不只是技术科学，而且包括处理各种事情的業務知識，例如高等教育政策等。把“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庸俗的或教条主义的理解，把非党的学者的覺悟水平做过低估計，認为他們只懂得資本主义的工业教育。对他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估計不足。我認为这种見解不是真正的馬列主义的，是教条式的或懶汉式的。

真正的內行应该是既懂业务又懂得馬列主义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人。可是在这两方面都精通的人是少的。大部份是一方面是內行而另一方面却懂得較少。或者是兩方面都懂得一些，但都懂得不多。

现在的教师們的覺悟水平与几年前相比是大大地提高了，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教育)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所以對於政治是能提出很多正确的意見的。

学校的領導人，几年来对业务(包括以上所提兩方面)的掌握也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与客观需要(就他的工作說)是差的很远的。

所以以后治校完全由教授包办是不穩妥的，另一方面党委的同志們又还不太懂鋼鐵工业教育，象以前在很少征求党外人士意見的形式下，来全权領導学校也是有問題的。

### 2. 党的領導与民主治校。以選舉出的院務委员会做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

党是应该而且能够領導高等教育的，在高等学校里党也应起領導作用，但是党的領導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党委制便是正在实行的一种，我認为党委制是有缺点的，因为党委会有最后的決定权，而这种決定权又不是在和广大的党外人士广泛討論的基础上作出，而只是在全体黨員的会上作出的。所以採納的意見就不够广泛，加以現在高級知識份子中黨員很少，而党委委員中真正参加教学的黨員更是寥寥可数，佔絕大多數的是行政部門的黨員，这样就使得決議容易帶片面性。也許与这种情况有关，使得行政方面的領導同志在学校中受到过份的尊重，而变为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又由于決定行政事务方面的人，就是党内具有決定性意見的人，这使得在行政上有了不同意見时，在党内也会受到同样人的反对。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学校事由党委討論決定，而党外人士的意見可能做为意見之一。这使得党的干部的作风簡單化而不去征求群众意見，不走与群众商量的群众路綫，这我相信与領導上的官僚主义和黨員的宗派主义是有关系的。

馬列主义者向来是主張以理服人的，在国民党黑暗統治时代，我們尚能走群众路綫，广泛征求群众意見，与群众商量，並通过說服爭論，使群众接受党的意見(集中与提高后的群众的意見)。也就是因为我們能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我們才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那末在今天，我們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更需走群众路綫的形式来貫徹党的領導呢？

有沒有比党委制更合适的形式呢？我認为有，这就是由選舉产生的院务委员会。也許有人会耽心，共产党員选入的很少怎么办呢？共产党員应该是最会为人民服务，最受人民愛戴的人，所以好的共产党員，一定会被群众所賞識，我們一向認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里不正是表达我們这一方面的信心嗎？

我們学校有数百共产党員，假若說共产党員竟然破选入院务會議的人很少，这将說明我們党的水平是不高的，共产党員不是人民所愛戴的，这就应该引起共产党員的注意。

假若我們采用了这种形式，共产党員將受到更广泛更經常的群众監督，这将使他們孜孜不倦的提高覺悟水平和业务水平，以使自己被选中为群众的公仆。这对于提高黨員的水平和

群众积极性都是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問題，就是在这个選舉出来的院务委员会上，能保證得出正确的決議嗎？能，党委仍應該討論学校大事，把党的決議通过黨員在会上提出並討論，在广泛討論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結論。黨員应该是善于走群众路綫，把群众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系統化和提高而使之再成为群众的意見。党的政策的执行不能強凭最后決定权，而应取得群众的真正贊同。

### 3. 一些具体意見

对于全院最高决策机构的院务委员会已如上述，另外的一些具体意見約略如下：

院長是国务院任命的，这是必要的，因为院長一职应是从整个国家的人力配备来考虑，而不是只在一个学校中来挑选。所以想以選舉的形式来决定院長是不恰当的，並且，我認为院長应该是院务委員，当然委員並担任主席。

我們学校的层次是很多的。据某些同志的初步估計，可分为六級，不但在办公楼里人才济济，而且系主任、教研組主任和部分教师也被作为行政人員使喚。有人說我們学校聚集了那么多德才兼备的干部，使得我們学校中的高級职位远远落后于适当按插他們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將学校机构精密化。

分別教务長和教务处长，总务長和总务处長的权限和責任是很困难的，听说曾有某同志把总务長叫做处长而受到了总务長的批評。这可能是兩者之差別是不大的。

我觉得总务長和总务处长这两級可以精簡一級，教务長和教务处长也可做类似的处理，行政方面的其他机构也可适当精簡。

我贊成有些同志的意見，就是將精簡下来的部份有力的干部配备到系里，承担系里的事务性工作。而系主任可以組織系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为系里的行政工作干部加强了可以使办公楼的工作能适当精簡，也許可以更密切的連系群众。又因为系里行政工作人員加强，也可使教研組的行政事务能适当減少。这样可以使教研組成为真正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組織。有人建議把教研組取消，另組織教学研究委员会，有的說組織教学研究核心小組，我觉得对于教研組这一类的組織問題在于如何做，如何將行政事务由其他的人或机构来承担，而不在这种形式的改变。

现在也有不少的同志把教研与行政完全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並且因此而产生了一些情緒，我觉得这种絕對分离是不可能的，必須承認有一些与教学和科学研究相連的行政工作，只能由教师担任。

总起来說，以前在党委負責制下，教师的作用是没有完全得到發揮的，教师的意見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对于教师的劳动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因之为了办好学校，必須扩大民主。为了使这种看法实现，需要有适当的形式。这就是把旧選舉产生的院务委员会做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須要适当精簡行政层次。

只凭干巴巴的几条馬列主义基本理論是治不好学校的。即使受了多年的革命鍛鍊，也需积极学习业务。党的領導是必要的，但民主治校是絕對不可忽略的，兩者都是办好学校的必要条件。其中的任一方面，單独的都不是充份条件。兩者是一統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 來函照登

54年下学期，我們曾就少先队一个队的活动，請总务处王慕林同志講旧恨新仇的故事。旧恨新仇是一个剧本，有同志介紹說王慕林同志曾是这个事实的在場人，因此，我們覺得請他来講一講关于这个故事的經過，一定更真切。

根据我們的回忆，王慕林同志当时並不是以講述个人英雄事跡的口吻来講述这个故事的。他講述了这个故事的始末，講述了許多同志們在緊張中怎样对付那些暗藏的敌人的緊張場面。前見“北京鋼院”上有些同志就这件事情对王提出批評，我們在这里提出一点解釋。

小學校 艾亞文 楊英梅 鄧如璋  
封冀平 左芷芳 胡素華

## 更正

73期院刊第三版所登“再听我們体育工作者的呼声”一文執筆李立三应改为朱立三。



提幾点意見供鋼院党政領導參考

郭楠在5月28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

(1) 信任中國專家

領導上對於蘇聯專家言听計從，不管是否切合中國實際情況，一概接受，而對中國專家抱着懷疑態度，使他們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教學與科研上受到莫大損失。我懇切希望信任中國專家跟信任蘇聯專家一樣，我說的專家不是資格老，地位高，而是學有專長，並有豐富經驗的。聽信他們的話，萬不可不懂科學，不是內行，而妄自作主張，或聽信在領導左右冒充內行者的話，便不信任中國專家，何必又用他們又怕他們，又不信任他們呢？用而不信是最壞的最有害的官僚作風。

(2) 警惕投機分子

幾年來有不少投機分子包括一部分教師和科學家在內，利用察言觀色，奉承拍馬，夸大匯報等手段，或不卑不亢的方法包圍在黨內或黨的左右，蒙蔽黨委，以達其上爬的目的。我深望黨領導隨時提高警惕，聽其言而觀其行。

(3) 黨政領導思想水平落後於客觀形勢

黨政領導的思想水平跟不上客觀形勢的發展，仍然用老一套的工作方式方法；騎在群眾頭上的上司或官派觀念和作風，隨時藏在思想的深處，作祟作怪；領導和群眾之間的距離和矛盾，日益顯著。因而黨領導和群眾之間的鴻溝和鋼牆越來越深越寬，越來越高越厚。要拔牆平溝，首先要清除老作風和老觀念。

(4) 落後與進步是相對的

中老年高級知識分子不是樣樣都是落後的，黨領導必須認清任何人都他進步的一面，也有他落後的一面。倘不承認每人（包括黨員在內）有落後的东西，那共產黨又何必整風呢？又何必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呢？調動一切積極力量，說明每人身上有積極因素，否則那不是一句空話嗎？

先進與落後是相對的——隨時隨地在變動中。絕大部分領導人在胡風反革命鬥爭中是能手，在“三反”“五反”“肅反”鬥爭中是積極的，但當他們看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就變得束手束腳，畏首畏尾落後了。因此千萬不可以把非黨教職工看成固定不變的，要注意他們的變化，重視他們的進步。最要不得的是簡單化，公式化。但許多做黨的工作，做團的工作，和做人事工作的同志都習慣於按照公式，按照黨團員和假積極分子的匯報去理解群眾，按照一張三格的簡單表格去私判群眾的終身命運，使他們永遠不能翻身。

(5) 認真趕快糾正“肅反”中的錯誤

有違法亂紀者應受國法裁判

鋼院在肅反運動中犯了不少嚴重的偏差和錯誤。凡是①不聽話者②受提意見者③不符合黨政領導意圖者④黨員對群眾懷私恨者都作為鬥爭對象，我就是這樣一個群眾。在肅反中把我扣上兩頂大帽子，“攻擊黨”和“攻擊政府”，我要求黨委會公布這兩頂大帽子的材料讓大眾來爭鳴一下。

在預備鬥爭我時，采礦系肅反小組副組長李興烈（系秘書，系黨支部書記，實際上是組長）先問我下學期（1955年下半年）有教學任務沒有，我答沒有。他很高興，而對我三星期的鬥爭展開了，但是缺乏鬥爭材料，怎麼辦呢？只好逼着解放前認得我的老年教師湊集材料：什麼在1928年誰介紹我進偽工商部當科長，什麼我在偽建委會十年不是好職員，什麼在1940年我辭去四川偽綦江鐵礦礦長等不相干的材料。在舊社會我也是不會吹拍，不聽話，不會獻媚上司的職員，因此李興烈說“這樣在新社會也不是好幹部”，在鬥爭中是組鬥爭，小組審問，粗暴的人身攻擊，任意辱罵侮辱我的親友。每天派出許多人，出去調查、訪問，歷時甚久，但始終沒有得到“反革命”証據。肅反結束時黨員馬副組長說“關於×××先生（教授）罵黨，罵領導，挑撥離間黨群關係，是人民內部事”，于是有職無權的組長站起來說“我們歡迎×××先生回到我們的隊伍里”請看看這兩個黨員的嘴臉，比變戲法魔法還要巧。要鬥爭誰，何患無罪名，不鬥爭誰，亦何患無說法。

肅反結束後，李興烈等同志與肅反辦公室王連甲同志明知道鬥錯了，但堅持遮蓋他們的

錯誤，把我交到“小組”處理，當然魏景昌，林楠兩同志也樂意把我整透。這一交就是一年多，還要寫出在北京、天津、武漢、上海、廣州、重慶等地換一句話全中國我認識的人名單列舉他們的年齡、籍貫、職業、出身政治面貌等等。照樣還得寫出在香港、台灣、在美國和歐洲我認識的人，不寫就是“抗拒”罪名。每天寫到半夜以後，整整寫了十幾天，預備這樣把我折磨死。但是對“共產黨”有信心，所以鼓起勇氣不死，以等待水落石出。我的工作也被無正式命令非法停止了，我幾次要求工作，也無下文，我到礦院聽蘇聯專家課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我這時對於1954年公布的“憲法”保障一個公民的權利，開始懷疑了。

我等待了一年多，黨委會不予結案。在這期間，我只好鑽進圖書館搞點科研，以苟延殘生。我還有五個幼年子女靠我教養，我不能為他們留下一頂“反革命”父親的帽子。1956年2月我愛人因憂慮生氣，好了八年的病復發了，住進醫院，我也因憂慮成疾，於3月住北大醫院。1956年10月我找高院長談話，他說他不知道這件事；同月我找黨委林楠同志談話，她說“現在領導上不是不信任你，你可以安心工作，因為有些材料無從調查（實際上沒有調查），無法向群眾交代”。這几句话矛盾很大，既然無從調查，就是仍有懷疑，那怎麼能信任我呢？既然無法向群眾交代，那就是不能結案，要我如何安心工作呢？而且我的工作早

在一年前被非法停止了。我堅決要林楠同志從速調查，以明真相，又是半年無下文。今年三月我又找林楠同志，問她調查結果如何，她說“把肅反材料再研究一次”。四月六日通過一個黨員通知我，四月八日林楠同志找我談話。四月八日下午三時我到她的辦公室，另外有采礦系黨總支書記王連甲在座。林楠同志交給我一份她已蓋章（四月六日）的肅反結案單，內容有三條①我於1950年春由香港回國係由統戰部介紹，經廣東、中南（武漢）統戰部介紹到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②我在海南島任偽海南鐵礦局長任內，對海南游擊隊無罪惡活動，③我在偽反動政府是一個普通國民黨員。我對②條有所聲明，不但沒有有害的活動，相反的我還幫助了游擊隊。當地反動報“和平報”（原掃蕩報）說“山上（礦山）有和平，（指我私通游擊隊），山下（指榆林港）無和平（指與游擊隊作戰）”，並說“海南鐵礦局長每月接濟游擊隊三千石米，三萬元港幣”。我的處境非常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在結案單上簽了字。林楠同志毫無認錯的表示。我不已要求她公開宣布恢復我的名譽，但她只囑王連甲同志到系里辦理。到了五月六日在一次系里到了十幾位教師的傳達報告會上，系黨總支書記王連甲將結案單內容宣讀，王說“這件事不能怪那一個，由黨委會負責”等語，毫無認錯改過的表示。王又說“當時我是肅反辦公室主任”，似很自傲。離我院“鳴”“放”前不到十天，可以看看這位黨總支書記對待整風的態度。

我現在堅決要求黨委會公開認錯，並公開登院刊恢復我的名譽，補償因此案我所遭受的損失。對黨員李興烈違法亂紀行為，交司法機關處理，同時我要求調回李興烈同志參加整風。

我們對於機械系專業設置及課程安排的幾點意見

機械系57年春畢業研究生 李立、康貴信、施東成、陳克興、王書林

目前，冶金部、高教部及我院即將組織有關人員對本專業的培養目標及課程的安排，專業設置等問題進行討論，下面僅提出我們的幾點意見，供諸參考：

1. 加強基礎課程，開設選修課程

我們從去年機五和今年機四的課程設計及畢業設計指導過程中以及我們自己的情況，感到過去東工及鋼院的機械系對基礎課程和英文，無論同學或學校都重視不夠。這就大大地影響了專業課的學習及畢業後的工作能力，尤其影響了自己以後在學術上的進修和進一步的提高，因此必須加強專業基礎課，開設若干選修課程，例如，電動機的選擇及計算疲勞強度、沖擊、金屬結構學、軋鋼工藝等需要在有關課程中適當地增加其份量。又如工程材料力學、彈性力學、塑性力學、振動學、高溫金屬及蠕變、應力測量方法、散性物體力學、潤滑及其設備、其他外國語等均可開設選修課，上述這些課程實際上有的在這次機四畢業前準備開講座以補足同學們過去所學的不足，而這些知識作為機械工程師來說是必需的。

2. 師資問題

開設上述課程的師資，一方面從培養和提高現有師資出發，另一方面爭取聘請附近學院的教授來兼課。

3. 專業課及專門化

對於專業培養目標，我們的意見正如教研組大字報所述，即培養設計計算方面的冶金機械工程師，專業名稱改稱鋼鐵機械專業。在此，我們並建議本專業再分成二個專門化，由科學上的系統性來看，軋鋼機與煉鐵、煉鋼機械之間的性質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多著重於彈性力學、材力等問題，而後者多著重於理論力學、鋼結構等方面，因此有分開的必要。另外畢業分配對口徑的問題，軋鋼機專門化的可以和哈工大軋鋼機器及工藝專業相互調配，煉鐵、煉鋼機械設備的可以和交大、連工的起重機專業互相調配，同時，全國在東工、重大、華中都有專業，且學生較多，也易于調配，因此分配問題是可以得到較好地解決的。而且我們應該回頭來看一下實際情況，事實上，現在同學大多數從四年級開始學專業課，在生產實習、畢業實習、課程設計及畢業設計中也分開了，搞軋鋼的同學學的煉鐵、煉鋼機器很久不用也漸漸遺忘了不少。同樣搞煉鐵、煉鋼的把軋鋼機也漸漸置於腦後。

分開成兩個專門化後，實際上即用最合理和合適的辦法精簡了專業課的份量，可以節省出一些時間，這些時間可用來加強基礎課。而且分專門化以後，某些課程（例如電力設備、自動化、安裝修理等）也可以在原有講授時間基礎上講得更加深入細緻。

另外，從科學發展的眼光來看，軋鋼機已經走出了冶金廠，踏入了機械製造廠的范疇，它已經在新的生長點蓬勃發展，因此它不應該再關在原來的領域里，而應該開始給予它某些獨立發展性。

因此，我們的意見，本專業應分設“軋鋼機”及“煉鐵煉鋼機器”二專門化，相應地，專業教研組也分成二個教研組（現在教研組里有三十餘位教師，過於龐大）。

4. 設計及實習

畢業設計中某些部份應精簡，某些應該寫到畢業實習報告中的內容不應該放到畢業設計說明書里面來。

因之，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即畢業設計與專業課程設計的關係問題，我們認為可以考慮畢業設計和課程設計合併，如果不合併則可以考慮調整一下課程設計的份量（例如只做一個部件設計等）。

節省下來的時間用來加強基礎課。

各次的實習時間可以考慮適當縮短，提高實習效率，尤其是小廠。某些資料的收集（描藍圖，抄數字等）過去在實習中所花的時間太多，其中有些是浪費，這應該由加強資料的工作來解決。某些圖紙及資料，資料科要設法從工廠或設計院收集齊備。另外某些用處不大的象工資表、工作崗位表等不要叫同學用特別多的時間去詳盡地細抄。

節省下來的實習時間可以用來加強基礎課。

5. 結束語

以上總的精神為加強本專業的基礎課程，打下機械工程師的百年大計基礎。因此需要適當地精簡專業課（用分專門化的措施來達到此目的），並減去設計和實習中某些可以精簡的內容，這樣就可以節省出一些時間用於基礎課及外文上，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學得更扎實和培養出高水平的工程師來。

因而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之一就是討論課程的安排原則、解決這些課程的師資及專門化之分設問題。



### 從“自治區”談三害

體育教研組 趙鍾

從舊社會的歷史中查考體育工作，顯然是“下品”。因為他們不懂得體育是一門科學，是培養青年一代積極有效的一種科學手段。今天我們的社會改變了面貌，國家把體育提到了應有的重視，並且明確地叫人們要認識“體育是共產主義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遺憾得很，體育在鋼院被三害圍攻而形成“自治區”了。

(1) 官僚主義從同志們所揭發的來看，我院所唯一的受寵長子是冶金系，當然其他系、教研組也就比較遜色，而體育教研組則更不在話下了。例舉事實一二，以勸君聽，以憑公斷，而從幫助黨內整風。

建校之初，我擔任教研組計劃工作與魏教務長談話涉及如何開課，魏教務長說：“體育課還上課嗎？”真使人大吃一驚。

54年或55年傅君昭教務長到教研組來說，高教部為了鼓勵同志們學俄文，你們可以報考，我當即問考試外文是否結合自己專業？傅答：不行，你們須考“政治”。此語至今我還莫名其妙。

官官相護偏聽偏信，不辨是非，形成官僚體系——55年有一天，魏、傅兩位教務長來參加教研組會，我們對他倆抱著莫大的希望，認為從此可見青天。首先魏教務長給我一個批評，說我是“個人主義”，“私自利”，“違法亂紀”和“私蓋印章”，原因是我寫了一個報告申請購買游泳季票以便教師進修業務，印章是金主任自己蓋的，有人證明。這事是發生在俄文教研組的一位同志，因私蓋印章被通報批評的第二天。我當即聲明與事實不符經傅教務長打圓場，才開完了一個不愉快的會。想來領導者的心情亦未必是愉快的，但這也就相繼形成了官護官的官僚體系的開始。

只聽個別同志的匯報，即決定對體育教研組的施政方針，不了解工作深處，滿足於表面形式——說來是令人痛心的。體育工作是一門包括有物理、生理、心理各門科學的綜合性科學，其中又分理論和技術兩個主要方面。就單說技術，又可分為田徑、體操、球類。更先不必談它的发展趨向。但僅就這些來說，就够學一生而不盡了。但却偏偏有些領導者們硬把這門重要而接觸面較廣的科學置於“等外品”之列。只滿足於那項競賽得了冠軍，那項如何如何。未聽取過教師們的意見。至於如何在高等學校實施體育教育亦從未見過任何指示，對於體育工作方面的要求則更是充耳不聞。一般認為體育工作者應該能夠耐熱耐寒，但對於體育工作者的工作特征一般就認為是不值一顧的了。這也難怪有些體育工作者，不願再叫自己的子弟學這一行。官僚主義的態度造成了體育教師各抱一角的單干戶。我們目前的工作是談不到

### 擁護“你鳴是放，他鳴也是放”

小 鋒

我先後看到院刊63期、68期上俄文教研組一鳴、二鳴同志及十名教師的文章以及物理教研組奔流同志的文章以後，我也談一談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對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從院刊有關文章內容中看出，俄文教研組在放、鳴的過程中，有一股小小“風波”，其中涉及會議主席、團支委和部份教師同志，使得會場當時一陣混亂；(5月25日下午會議)實在其原因不外是對“你鳴是放，他鳴也是放”缺乏全面了解所致。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主要是根據上面所提到的同志對那天開會的介紹……。會議主席就說：大家要給黨委和院領導提意見，而少給教研組和教務組黨員提意見……。接着就有幾位同志向主席提意見，認為他這樣講話是不恰當的，這實質也就等於不讓大家对教研組的黨員提意見因而激起了同志的不滿。我認為主席所說少提並不等於不讓大家提，也不是說這次會不能提，下次會也不能提。如主席真的不讓提時，我們指責他撤換他，也不為晚。在會議進行中有同志就說：“不發言的是拍馬屁”，團支委發言後就有人質問：“這樣講話是什麼意見”。有人走到黨員面前聲包俱厲地指着鼻子問：“你那點比我好？你說？”甚至還有人制止別人發言，這些情況，反映出大家要求揭發矛盾的心情是強烈的，具理力爭的情緒是飽滿的，但缺乏冷靜，因而情緒激昂，使得會議難以正常進行，從而把一些時間糾纏在會議怎樣開和討論你的態度如何？你為什麼扣帽

集體合作的。但責任心鞭策着人們的良心，我們熱愛着年青的同學們，只有各抱一角的去完成工作，我們只覺得对不起黨，和那些正直無私的黨員領導同志們的教導，而對於那些官僚主義者們則可引用兩句話以表微意：“從來體育是下品，解放以後才翻身，不料官僚使復古，令人髮指諱莫深”。

(2) 宗派主義——我所說的不是黨和羣眾的宗派主義，因為我們組內沒有黨員只有團員，而團員一般說來是比較好的，我對這一點沒有任何感覺。

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宗派主義，因為我組有好幾位教師不是體育學校畢業的，是運動員轉業的，我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評薪時，金主任說：“你們不是學體育的，要補四年！這是教務長說的”(那位教務長我不知道)，真是言出法隨，整整四年才升一級。不幸的事是第二次評薪時，不獨未升反而降了一級，至今猶不明究竟。想是四年未滿之故吧？建議訂出升級考試標準，以便有所遵循。

(3) 主觀主義——由於這一思想的发展，我院所出現了很多“傑出人材”，創造性的發揮了他們的主觀主義。記得有一天，54年郵亭事件前後，黨委宣傳部姜淑玉同志(黨員)在路上碰見我說：“你有些什麼思想問題，可去找林楠同志談談”，當時我真是摸不着頭腦，想來她是黨員，其中必有原故，好意與否固不可知，何以就斷定我思想上有問題呢？切盼姜同志對此能作解釋。

### 對學校黨委會的意見

(1) 從揭發出來的事實來看，個別黨員品質是惡劣的。這和黨委的姑息、縱容是分不開的。個別黨員竟私設法庭，跟蹤追跡，動不動就掌握了材料。試問你們抓到幾個反革命份子，有些問題不敢公開來，為什麼要以損害羣眾的名譽的辦法來達到主觀的愿望，我受了黨的教育八年，有生未見有如此者，可見我院所官僚主義為害不淺。

(2) 主觀的論斷改變不了事實，任何的主觀論斷都是唯心的。既然我們都信仰唯物主義，就應該共同反對唯心之論調，以達到爭鳴的目的。如果組織上對我懷疑，敬請把材料公佈，使大家心明眼亮，口服心服。

(3) 地下工作的辦法不宜繼續。這樣有損黨的威信。如果說某人向組織靠攏，不尊敬個別黨員，除了表示這個同志的修養不够外，應加以教育和幫助，難道說用組織力量損害名譽，地下圍剿，發動冷戰的辦法就可以達到教育的目的了嗎？除非採用“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辦法。黨中央的整風運動英明的帶來了垂死的小百姓的生机，警惕的教育了黨內的領導者們，任何的官僚、主觀、宗派以及所有危害黨的利益的都將要被清除，尤其是那些主觀的唯心的想法，都會被物質的存在報以“嘿！嘿！”的冷笑的。

子？他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則做解釋……等問題上去。

我認為在鳴、放過程中，是會遇到一些新的問題的，但不應过早怪罪別人，壓制發言，亂扣帽子，或急于表示不滿。而應有這種認識：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見；你同意別人意見是放；別人不同意你的意見，而發表自己的意見也是放；揭發矛盾問題是放；分析問題提出建議也是放；你鳴是放，他鳴也是放，只有通過在爭的過程中繼續放，才能使鳴放逐漸趨向深入，才能逐漸進入辨明是非，才是與人為善地、和風細雨的幫助黨整風。

所以我認為壓制別人發言，給別人扣帽子是一種不冷靜的表現；只准我鳴，不准你鳴；追問別人發言是什麼意思、喊撤換主席……這種急于責備別人扣帽子或武斷認為別人壓制批評的同志的做法，是會影響鳴放的。

因此我的看法和態度是：除了同意一鳴、二鳴、奔流得十名教師文章中的正確意見和合理建議部份外，我是反對在鳴放中缺乏實事求是，與人為善，甚至夸大其詞，發洩私憤，漫罵……等等做法和態度。這種做法和態度只會在填溝、拆牆的過程中，又可能產生新的裂縫和屏障。然我這種提法，並不意味着，對存在矛盾問題加以寬容，對阻礙運動的現象加以縱容。總之我感到為助黨整風的我們，應尽可能地，恰如其分地，實事求是地，不含有意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在鳴放中貫徹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進一步團結的目的。

### “鳴”“放”雜感

錢 研

在過去肅反運動中，不僅錯鬥了一些同志，而且在鬥爭時沒能容許申辯，因而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而後必須“平反”，檢討錯誤，賠禮道歉，這種教訓是我們必須牢牢记住的。如果說過去是把同志誤認為“敵人”，那麼今天對一些明明是有錯誤和缺點的同志顯然不能重復肅反鬥爭的方式。

俄文教研組一鳴同志在院刊上寫了一篇文章，引用了魯迅的名言——“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對一些現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結果遭到俄文教研組十位教師和物理教研組一位教師的激烈反對。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而與之爭論，當然無可厚非。可是在文章中除了一鳴“為虎作倀”和“為黨作倀”，使人感到一種威脅的氣氛，這怎麼能說服他們的對方呢？而且把“黨”比作“虎”，至少也顯得有點不客觀吧！

究竟客觀上有沒有“謾罵”呢？雖然不多，但的確有一點。當然對個別黨員違法亂紀的行為和惡劣品質激起公憤實際上也是(包括黨員)是完全應該的，有些過去受過委屈的人，現在說幾句氣話，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人情之常，實際上黨也並未計較。可是也有極少的人並不僅此，他們一般地把黨員稱為“老爺”把靠近黨的人叫做“為虎作倀”，說一些冷嘲熱刺的話，他們雖然在要求別人“大鳴大放”，但決不許別人說和自己不同的話，否則就是妨害“鳴放”。顯然，大多數同志是公正無私的，他們的批評很尖銳，態度很嚴厲，雖然也難免有出入或不當之處，但總的說來使人感到很親切，很中肯，很理直氣壯，作為鋼院一個極普通的成員，我是非常支持這種態度的，而且希望領導上能大力提倡這種態度。“忠言”雖然“逆耳”，但對工作和整風却“善莫大焉”。最後我希望全院同志本着親如一家的精神來大鳴大放，把一切壓別人鳴放的帽子和打別人爭鳴的棍子都扔到垃圾箱里去吧！但應杜絕那種不許別人爭辯，只准獨鳴獨放的“專橫”作法。

### 來函照登

數學教研組 容爾謙、朱元泉

編輯同志：

一、看了上兩期刊章守華教授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及李梅英先生的文章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把當時我們所經歷的過程加以說明。請你們刊登為盼。

### 事情經過

在柯俊系主任征求劉主任意見不同意換人後，魏教務長找朱元泉了解情況。當時徐處長也在場，教務長提出工業部及院長的意見，希望教研組想辦法“能換還是換”。朱當時除把組內教師工作任務情況介紹外，並說明不應換人，但教務長一定要我們再想辦法，並且說部里有司長來听课，希望我們換人。朱表示還要回去商量，不能決定。最後教務長、徐處長仍然表示部里、院長和他們的意見，希望換人，而且說要快作決定。

二、朱回來後碰見容爾謙及解基培同志交換意見。我們認為不應換人。在日後教務處、業餘教育科緊催此事，仍然表示希望換人，並且催問那位教師能講。我們馬上打電話請示劉主任，並向他匯報以上情況，這時我們才知劉主任早已知道此事(柯主任找劉主任談過)。當晚劉主任就到我們宿舍來研究，恰巧解基培、錢文俠和我們都在一起慎重的研究此事。我們當時一致意見是在原則上不能同意，假若領導上非換不可，我們只能執行，但是只允許換一個班，另一個班絕對不換。我們還考慮了假如非換不可，就請錢文俠同志擔任，並請劉主任和李先生去談，這是在一個禮拜五晚上的事。

三、次日就由朱把我們意見全部告知魏教務長，後來就接業餘教育科質料科長電話決定由下週起換人。魏曾告知質料科長要和李先生解釋清楚，但是據質料科長自己談，他願與李先生面談，他就簡單地用一張條子停止了李先生的工作。

### 兩點聲明

一、在章守華教授與李先生文章中提到，當劉主任不同意，“質料科長就與朱商量決定撤換”這與事實不符。朱只是接過買一次電話(內容如上)並未見過此人，也不認識。

二、事情雖然在很早以前就產生了，但以上所述事情是在四、五天之內發生的，且在領導上態度堅持考慮換人的情況下，我們與劉主任接觸協商不够，這是我們應該負責的。